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家——于右任

许增

[西南师范大学于右任研究中心 教授 重庆市 400715]

提要: 辛亥革命时期的于右任创办了四份报纸,并发表了数百篇诗文,针对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及“预备立宪”,帝国主义的侵略,民生的凋敝,人民的反清斗争与革命党人的活动,民国的建立和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等,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或揭露,或抨击,或鼓励,或颂扬,或讲形势,或说道理,或大声疾呼,或幽默讽刺,对民主革命的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于右任 宣传家 神州 民呼 民吁 民立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K257

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上的一座旧的深灰色中西式建筑物上赫然写着“新华日报”四个大字。这笔力遒劲的四字,是现代书法大师、“于草”的创始人于右任所书。在国人的心目中,于右任是国民政府元老、鼎鼎有名的中国近现代书法大家。但是,好些人并不知道,这位美髯飘胸的“西北奇才”,在20世纪初的革命宣传中,以如椽巨笔,威震沪上,令清吏丧胆、侵略者心寒,使民众振奋,对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启蒙老师民族思想和新学的启迪,加上晚清社会现实的刺激,青年时期的于右任已产生了朦胧的反清思想。因此,他在诗中对时政有所讥刺。当这些诗刊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后,陕甘总督升允即以“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1]的罪名奏准缉拿于右任,就地正法。于右任仓皇逃至上海,化名进入震旦学院。在上海就学期间,他逐渐感到办报以宣传自己主张的必要,于是与几个同学商定,准备办一份以《神州日报》为名的报纸。为筹资并考察报业,他于1906年东渡日本,并在东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是年底,他带着所募资金和孙中山授予他的“长江大都督”头衔,回到了上海。自此至二次革命失败,于右任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为宣传革命的阵地。

1907年4月2日,以于右任为经理的《神州日报》创刊。孙中山要于右任把此报办成革命的机关报^[2]。报社的主要成员于右任、杨笃生、庞青城、邵力子等都是同盟会员。该报的宗旨,即如于右任所说:“《神州日报》的主张,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3]所谓“祖国思想”,就是“民族主义”思想——反满与争取民族独立。这从该报不奉清朝正朔而采用甲子纪年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出来。《神州日报》在于右任主持期间,充分体现了这一宗旨。它用大量篇幅报道同盟会领导的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以及各地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在报道中,有的还公开引述革命党人的激烈言论,如“颠覆现政府,谋立共和政体,分配土地,使国民亲爱自由平等”,从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反清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与思想。同时,该报还大量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官吏的贪黷受贿,暴虐凶残,庸碌无能;揭露和批判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宣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广泛报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呼吁国人起来御侮救亡^[4]。

宣传革命的报纸，易引起清廷注意，于右任等人办《神州日报》时，充分注意了这一点。他说：“那时距《苏报》案大狱不久，《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又相继被封，政象黑暗，民气销沉。我们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5]由于注意了策略，又宣传了革命，说出了民众的心声，报纸销路大畅，跻身大报行列，竟可与历史悠久的《申报》、《新闻报》分庭抗礼，对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和革命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不幸的是，《神州日报》创刊不久，即遭火灾，虽勉力支撑，终感蹙蹙，于右任辞去了经理职务，结束了该报 80 天最光辉的于右任时期。

于右任离开了《神州日报》，但并未改变办报之初志。1908 年 8 月 27 日，他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去岁创办《神州日报》因火后不支退出，未竟初志。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亦初创神州之志也。”^[6]该报出版前又登出广告说，本报“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对于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无所瞻徇”^[7]。“‘民呼’两个字，即‘人民的呼声’之简称，于革命运动上为一鲜明的标帜，于文学技术上亦为大胆的创作。因为那时我们所代表的，已不仅是复古的民族运动，而是总理的三民主义了。”^[8]由此可见于右任办《民呼日报》的宗旨。

1909 年 5 月 5 日起，《民呼日报》在刊行的三个多月内，大力报道清朝官吏贪污腐化、鱼肉人民的恶行，报道全国的人祸天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以至人相食的惨景。特别是对甘肃严重的灾害及那里的官吏匿灾不报，不顾民命的秽行作了重点报道。并通过这些报道来制造清朝气数已尽和宣传“鼎革”的思想。该报在社评中指出，“中国衰弱病之总因”，就在那些“如死人、如魔鬼、如狼如羊、如蠹蠹、如蝗蝻”之大小官吏身上。这些官吏腐败日甚，使其统治的中国之衰弱病至不可救药。因此，必须用“人为淘汰之术”。而“稗政以失民心”，“水旱以夺民命”，即为一个朝代“大命已去，鼎革之祸以兴”的征兆。清朝则正处在这种状况下”^[9]。

《民呼日报》宣传报道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当时的路矿问题。该报评论时局的文章指出：“今世伤心之事多矣，而独莫过于路矿，卖者、攘者、争者、阻者，无一日不累累发现。”^[10]于是，《民呼日报》就集中力量在路矿问题上去揭露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支持人民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利权的侵夺。与《神州日报》一样，《民呼日报》也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并积极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民呼日报》对清吏，尤其是对陕、甘二省官吏的口诛笔伐，引起了他们的忌恨。在陕督与上海道台的诬控之下，租界会审公廨将于右任拘押了一月零七天，《民呼日报》也被迫停刊。

然而，于右任并未因受此打击而罢手。《民呼日报》在其最后一期发表了如下言论：“于君狱中书至，持论正直，至身宁死而不停报馆。”“民呼报以于君而出，有于君而后有民呼报，则于君即民呼报之灵魂而已。于君不死，即民呼报之灵魂不死，他日必有千百民呼报发生于世界。”^[11]果然，不久后，《民呼日报之最后广告》即刊登于上海各报，谓：“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呼日报社承接。所有一切应收应付款项，以后概归民呼日报社经理”^[12]。于是，《民呼日报》改头换面，以《民呼日报》的报名向法国领事处注册。1909 年 10 月 3 日，《民呼日报》正式出刊。因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再任社长；但如前所述，他仍是民呼报之灵魂。诚如于右任对“民呼”之解释：“分析‘呼’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13]。反动派迫《民呼》停刊，将于逐出租界，欲以此封“于某之口”。然而却并未封住，现在又顽强地以“民呼”之名再创新报了！

《民呼日报》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报纸讥时政，觐民情，存清议，维国学，表异闻，并将发出振聋发聩的天骥独嘶，成为唱白环宇的振羽雄鸡，以使黑暗的神州红日再中，把

既倒之狂澜奋起力挽^[14]。这是于右任为《民吁日报》确定的办报宗旨。从中可以看出,在受到迫害挫折之后,于右任的心气不但毫未消颓,斗志反而更加旺盛。

《民吁日报》出刊后,确实频频发出“天骥独嘶”,言他报之不敢言,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反日反清宣传。冯自由在《上海民吁日报小史》中写道:“时当日人侵略满蒙,至为急进,清廷向守‘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政策,丧权辱国之事,层见迭出,举国人士靡不痛心疾首,海上各报以惧于官吏积威及日人暴力之故,咸噤若寒蝉,莫敢抗议,独民吁报不畏强御,日以危言警惕国人,使为之备。”^[15]该报反对日本侵略,可谓不遗余力。在《民吁日报》共出的48期中,被日本领事指控有反日言论的文章就有62篇之多^[16]。

在反日宣传方面,《民吁日报》指出,日本侵略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危险,并围绕日本违约擅自改变路线修筑安奉铁路事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连续报道和评论,肯定由此而引发的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正义性。日本前首相、朝鲜监国伊藤博文到满洲后,《民吁日报》不断发表评论,指出伊藤此行之目的在“调查中国内情,监督中国财政”^[17]。伊藤在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死后,该报又连续发出20余篇评论和报道,认为伊藤罪有应得,并称赞朝鲜爱国志士为国舍命的精神当流芳千古。

《民吁日报》虽把重心放在反对日本侵略上,但亦未放松对清朝政府的揭露与诛伐。它揭露清廷立宪之骗局,甚至号召人民与专横、残民、卖国的清政府相对抗,进而取而代之。

《民吁日报》高举反日侵略的旗帜,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遂向上海道施加压力,又通过会审公廨判决封闭该报馆,“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18]。《民吁》较之《民呼》,寿命更加短促,仅刊行了48天,“于某之口”再次被封,于右任去日本,后应马相伯之邀,返沪在复旦公学任教。此时,国内革命风潮日渐高涨。于认为有再办一份报纸鼓吹革命的必要,那种挫而弥坚的顽强精神又在他的血管内涌动。“余固知讦讦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在《民立报》发刊词之最后引用的《离骚》中的这个句子,正是此种精神的写照。1910年10月11日,新创办的《民立报》在克服重重困难后与世人见面了。

《民立报》存在的时间有三年之久,而这三年中国的时局变化又特别大,因此该报的宗旨随形势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其宗旨则如于右任在1940年所说的那样:“《民立报》时代,可算是同盟会革命运动的急进时代。我们的任务,一面在揭发清政府之毒,唤起民众;一面在研讨实际问题,作建国的准备。”^[19]《民立报》创办后确实是这样做的。它揭露官吏的贪婪、卑劣、卖国,抨击清政府冥顽不仁,倒行逆施,警告民众对其“万无可恃”,公开宣传战胜政府,改造中国。它又用大量篇幅宣传革命,如报道孙中山在国外的活动和演说,连续报道黄花岗起义及革命党人的英雄事迹、革命党人对清朝文武大吏的暗杀活动以及四川的保路运动等。武昌起义后,该报更成了革命党的喉舌,独立各省的通电、通告,皆由《民立报》转发;孙中山从国外返国途中的第一份电报,也是直接拍给《民立报》刊发的。《民立报》还为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制造舆论。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反对共和、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暴露,《民立报》转而诛伐袁世凯,率先转发英国路透社的电报,将袁氏“善后大借款”的内幕揭诸报端。直至“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无法立足,于1913年9月4日被迫停闭,一共发行了1036号^[20]。

从1907年~1913年的7个年头里,于右任创办了四份报纸。这些报纸,由于出版时的形势不同,故在风格上有所差异,内容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神州日报》“颇似古典文学”,“以沉郁委婉见长”;《民呼》、《民吁》则更大众化,“已接近现代文学”,“以发扬蹈厉见长”^[21]。但它们却有一脉相承的共同点,这就是对清朝统治黑暗、腐败的抨击,对民间疾苦的关注,对列强侵略的激愤与揭露,对革命与爱国的宣传和鼓励,因而成为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消除民众对

清政府的幻想之舆论机关。于右任以革命党人的身份，连办四报，坚持宣传民主革命，无论是在革命党内还是在新闻界，都是罕见的。

于右任不仅创办报纸，而且手执斑管，笔走龙蛇，在其所办的四份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就目前所收集到的，有社评、小品、新闻报道、函电、诗歌等 347 篇。这些诗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写法亦变化多端，时而义正辞严，时而幽默讽刺，时而悲愤呼号，时而怒骂嬉笑，时而长篇大论，时而寥寥数语。笔触所及，令读者随之而悲、愤、哭、笑、爱、憎。这些诗文是对黑暗社会的宣战书，是点燃革命烈焰的星星之火，是掷向官僚贵戚、汉奸列强的匕首投枪，是呼唤国民奋起的战斗号角，其突出的内容有以下数端。

首先，揭露、鞭挞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媚外卖国，“立宪”骗局 对于清朝官僚的贪污受贿，不顾民命与国运而只知醉生梦死，于右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他对那些天潢贵胄大张饕餮之口贪污受贿，极为愤恨，揭露道：“贝勒贝子个个手笔都大得很，那里看得上这几千银子！”^[22] 他讽刺军机大臣：“勿负责任只吃饭，饭吃饱了只去睡；两眼朦胧，两手只受贿，也不管他人民痛，乾坤碎。”^[23] 墨吏余诚格在陕西任官时，“加税病民”，被逐出后又卷土重来，居然升为巡抚。于右任在揭露此事后，笔锋一转，直刺清政府：“近来有最奇之一事，即凡病民病国之吏，其升官无一不速是也。噫！天下事可知矣。”^[24] 官吏们不顾人民死活，全国各地，“盗贼干戈，疠疫水旱，内内外外，哭哭啼啼之声，伤心惨目，而在上者依然歌舞也。”^[25] 不仅如此，他们还滥杀无辜，残民以逞：“广州得一首级赏一百元。杭州之米贵风潮出现，竟曰‘格杀勿论’。”对此，于右任不但愤怒地加以谴责，而且认为人民的反抗势所必然。他说：“民命之贱如此，官吏之横如此，中国前途之危如此，呜呼，欲上下不解体，岂可得乎！”^[26] 他把整个社会出现的“瘟疫水火兵戈”，“生灵涂炭”，归结为“无一非政府失职之所致”^[27]。因此，他直斥清廷为“鬼混之政府”^[28]，“荒淫之政府”^[29]，“万恶政府”^[30]。

于右任对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卖国行径亦大力揭露与鞭挞。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边疆蚕食鲸吞，警报频传，而清吏却无动于衷。对此，于右任《兵火中之歌舞声》一文揭露、指斥道：“近日西藏也，云南也，蒙古也，满洲也，新疆也，无一日无告急之报，而大小臣工仍征歌选声不已。呜呼，其有心肝乎！”^[31] 在《大卖国如何》一文中，他揭露清政府只惩办小卖国者以掩人耳目，而对那些“卖路卖矿，失国权，通外国”的“大卖国奴”却包庇、纵容、支持。并揭露这惩小纵大的实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岂不然乎？”^[32] 于右任还规劝那些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国民，万不可存“希望政府之一念”，并举出清廷四条“有心误国之罪证”：庇护盘踞要津的卖国官员；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巨额外债；蹂躏一切救国之机，行屈辱外交，大举外债而不听任何反对意见，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国可亡，民可弃，而孤寡专制之政体永永不可变易”。因此，他警告大家，不要“以希望政府一念蹉跎生误，失此救国一瞬之机会，以重贻后悔于无穷也”^[33]。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也是于右任猛烈抨击的对象。在《中国改革谈》一文中，对预备立宪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说，全国上上下下，沸沸扬扬，都在谈立宪，谈改革。不久，谘议局、资政院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的名义定了，立宪君主国之诏颁了。然而，“改革之文山积，立宪之诏风行，而至于朝密勿之地，则如以十重厚障，置之五里雾中，令人群焉迷其所向，官吏昏暴于上也如故，人民憔悴于下也如故，外人之恣肆言论之摧锄也亦无不如故。吾然后知政府之所谓改革者，不过欲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不为党人所煽惑，……而向之所谓明诏大号者，皆无非滑稽游戏之文章也”；而立宪派之所谓改革者，“不过借立宪之名，使各省举议员，凡向日无钱捐官、无资格出洋、无科举进身者，借此以干预公事，为升官发财之基址而已。求之政府，既日以牢笼操纵为得计；求之人民（按：当指立宪派），又日以钻营幸进为本图。”^[34] 对清廷颁布的《钦

定宪法大纲》，于右任称之为“害法”大纲，“臣民未受宪法大纲之利，先受宪法大纲之害”^[35]。所谓“立宪”，实际上是在行专制，把海陆军军权等一切权力，全集中到极少数亲贵手里；新设的内阁也是一个“排汉内阁”、“朽骨内阁”，其设立“实将以巩固旧有之专制政体，此后发政施令更无复容汝民置喙地”^[36]。他告诫国民，“欲托生民(命)财产于将来似是而非之宪法，真做梦也。……欲托性命财产于将来之贵族内阁，真做梦也。”^[37]“有真国民始有真宪法，故立宪之事，当望诸国民，不当望诸政府。”^[38]让国民来立宪，岂不是要把清政府推倒？

其次，宣传反侵略，爱祖国 对于列强、尤其是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于右任极为关注，并将其揭露出来，以警国人；号召国民起来反抗侵略，挽救自己的祖国。

日俄战后，日本对中国更加虎视眈眈，不断派人至中国刺探情报。于右任向国人敲起警钟：“请上海商人放眼一观，某某国之对我何如？臣谋于朝，民谋于野，口和平而实无日不思侵略也。”^[39]又揭露说：“某国人入内地者，最少不下四五万。有受其政府津贴者，有为其一团体所委托者，其对于我不怀好意，则一也。”^[40]与日本争夺满州的俄国，也日夜窥伺东北。日、俄、英、法、德五国又相互勾结，阴谋瓜分中国。而“我残忍不道之政府”只图自保小朝廷，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人必须奋起自救。他援引范蠡击鼓兴师以灭吴的史事，要国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和思考这样的问题：“强国之对弱国，无所谓人道，无所谓天理，更无所谓面皮，只求成功而已，虽居禽兽亦可也。倘国不自立而欲倚人、恃人、求人，哀求人怜，更欲求人容过，一次复一次，则自速其亡而已！断断不幸者也。吾国民其思之，思之再思之。”^[41]

不过，于右任认为中国不会灭亡，他在《民立报》上连续刊出《中国不亡论》，以鼓舞国民救亡的信心。他分析中国不亡的理由，一则“我以如此伟大之国民，而区区者夫又何足虑！且中国处正义地位，“得道者兴，失道者亡”；再则，“就军事而论，吾国人当兵之坚忍力多为各国所不及。……况柔术之精，冠绝全球。而历史上所称，如燕赵健儿，江淮劲卒，与夫关西六郡良家之子弟，其歌谣慷慨之风，今尚未衰，整齐之而利用之，区区小儿曹何足惧哉！”^[42]

他特别强调，反侵略、卫祖国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不能依赖清政府；因为清政府已是一个“不恤乎卖人民”的政府。“瓜分之祸愈迫，人民与政府之冲突愈不得免。政府既与人联盟以瓜分吾国，吾人即当共认为祸我之戎首。”而依靠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以与列强自为战，衡以近世历史之公例，要未有不能制胜者也。”^[43]

要靠自己的力量捍卫国家的独立，中国人就须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他召唤中国男儿：“敢告青年，行止坐卧莫将‘祖国’二字忘却。”^[44]他要让“男儿须知”：“无牺牲的精神，非英雄也。故为国牺牲，为民牺牲，为道牺牲，为事牺牲，不畏强御，不求报酬，如是方谓之大人物。……故男儿牺牲，当自国始。”^[45]

第三，宣传反清有理，颂扬革命壮举，反对袁氏独裁卖国 于右任在揭露清廷的黑暗、腐朽、残民、卖国后，就进而宣传人民的反抗、革命党的起义和暗杀之合理。他在《近事感言》中写道：“吾见今之当局者，千其政，百其令，离奇变幻，莫可究诘，而总其要义则不过曰，吾力能置汝民于死地。夫日日与人共国家，日日资人之力以自养，而日日自号于人曰，吾将置汝于死地。世固有出其力以养人，而甘心死于其人之手而不悔者乎？故人虽至愚，亦必求所以反之之道矣。等死耳，呼号宛转以待命亦死，竭此仅有之力以相搏击而终不胜亦死，而况天灾之相逼于其后者，又日驱之使即于死地。与其束手以就天人之戮，何冒万死以求一生之为幸乎？此则今日乱事所由不绝于天壤也。”^[46] 黄花岗起义后，他论革命党产生的原因曰：“革命党者，不良政治下之产儿也。”^[47] 武昌起义后三日他又著文道：“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何也？制造革命党也。”^[48] 反清有理！革命有理！这就是于

右任欲向天下人揭示的真理。

于右任在阐明反清革命有理的同时,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大加歌颂。他满怀激情地赞颂黄花岗之役:“南风四月,长日难消。得此惊天动地之杀声,亦足为河山壮气!”^[49]他称颂武昌起义胜利之神速:“武汉据天下之形胜,在吾国地理上、历史上所谓易进取而难保守者也。今日革命党得之,又据兵工厂,断京汉路,渡江与外人周旋,赴势如迅雷。其愤如此,其激如此,其速如此。”^[50]对革命党人的英雄事迹,他给予赞扬和很高评价。他称颂黄兴:“近来河口之役,镇南关之役,皆黄兴为之主动(官场拿之数年),其人悍而有谋,出入虎口视为故然”,并赞其为革命党中的“健将”,“魄力一时无两”^[51]。又称赞黄兴的胆略:“黄兴逃后,又用书吓李提(按:指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真大胆哉!真大胆哉!”^[52]他还借南洋华侨之口褒扬黄花岗起义烈士:“此百余人者,牺牲其个人之身家性命,为国而死,不可无以表彰之。”^[53]为建设真正议会政治而被刺杀的宋教仁,于右任为其著长文,吟诗赋,发演说,写铭文,称宋“是好男子,是大英雄”,“所僵卧者,裹创之躯体;而不泯者,概世之英风”^[54]。

中华民国建立后,于右任一心想在中华大地上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辞职,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反革命、假共和的真面目尚未显露出来,此时,于右任是拥护南北统一的。宋案发生,袁氏真相暴露,于右任即起而揭露,挞伐之。他在追悼宋教仁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贼时时欲杀吾国民,破坏共和。”杀先生者,“乃实以勋位诱人者,是此人即破坏共和者”^[55]。他又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写了《卖国新契》一文,揭露袁世凯出卖中国以换取帝国主义国家贷款之丑恶嘴脸。

此外,于右任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亦甚为关注。他大声疾呼:“金融界之命,操之外国银行。吾国人欲在商业上放异彩,非自立银行不可。”^[56]他呼吁把煤矿、铁路等企业收回自办,并对出卖路、矿权的官吏豪绅大加揭露,敦促政府严加惩处。

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创办了四份报纸,并发表了数百篇诗文。针对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或揭露,或抨击,或鼓励,或颂扬,或讲形势,或说道理,或大声疾呼,或幽默讽刺;其讥刺入木三分,其揭露大胆彻底,其呼号慷慨激昂,其分析鞭辟入里。加之,所办报纸时间长,发行量大,其文其报对革命宣传贡献之大,在当时是仅见的,故有“一枝笔抵十万毛瑟(枪)”之誉^[57]。称于右任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家,是当之无愧的。

注:

[1][3][5][6][8][10][13][14][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于右任辛亥文集》,272,259,259,18,259,23,280,31,260,260,96,101,190,134~135,171,172,89,172,214,133,155,158~161,32~34,102,90~91,95,104~105,145,161,127,125,73,78,86,93~94,154,122,120,207,166,214,167,214,168,171,184,255,254,14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4]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491,495~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转引自许有成:《于右任传》,5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9][12][15][16]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523~524,534,536,5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 惜秋:《民初风云人物》下(第十辑),687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民国七十三年一月版。

[17][18] 《旧中国大博览》上,194页,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5。

[20] 参见惜秋:《民初风云人物》下(第十辑),692~696页;《旧中国大博览》上,206页;许有成:《于右任传》,86~87页。

[57]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1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张颖超